

BEI JING SHE HUI KE XUE LI LUN ZHU ZUO CHU BAN JI JIN ZI ZHU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TUDIE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研究
史论

侯且岸 著

北京出版社

92497

毛泽东研究史论

侯且岸 著

北京出版社



毛泽东研究史论
MAO ZE DONG YAN JIU SHI LUN
侯且岸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学校三元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52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00—02789—8/B·51

定价:9.40元

自 叙

90年代以来,毛泽东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研究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社会上也随之兴起了一股“毛泽东热”。

应该说,今天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心态是复杂的,纪念他的方式多种多样,认识他的角度也有所不同。自然,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也会产生各自特有的毛泽东观。平常人如此,研究者亦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投向毛泽东研究史。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研究进行研究,对毛泽东研究作一冷静的反思。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小书就记载着这一反思的初步成果。这里,我想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扼要地谈谈这本书的构想和特点。

在本书中,我将毛泽东研究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并充满矛盾的曲折发展过程。根据历史实际,我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草创时期、曲折发展时期、停滞与勃兴时期、走向成型的新时期),并且把这一过程的起点确定在1936年,以从属于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作为重要的标志。书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埃

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对毛泽东的介绍、宣传，说明正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揭开了毛泽东研究的序幕，解开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革命之谜和毛泽东之谜。至于稍后在中共内部出现的“早期毛泽东研究热”则应视为中共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直接产物。这种背景决定了草创时期的毛泽东研究是比较健康的，尽管也确实存在着过分突出个人作用的倾向，但健康的一面毕竟是主流。当然，在书中我也十分注意反映毛泽东研究的曲折性，着重分析了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等人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乃至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研究造成的危害。通过展现彭德怀、张闻天、罗荣桓、田家英、杨献珍、何干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对“左”倾思潮的英勇抗争，再现了中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坚持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思想主线。这条主线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互衔接，对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条路线的指导，毛泽东研究终将在曲折中徘徊。

在本书中，我把发掘毛泽东研究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重点、特点作为主要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重点、特点的确定又不能脱离时代、社会、政治背景。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服从于学术的要求，它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左右，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重点、特点要打上深深的历史痕迹和政治斗争痕迹。读者在书中会看到这种种痕迹，这些痕迹不应在毛泽东研究中抹掉。无须讳言，在毛

泽东研究中,研究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文化大革命”前大量的“语录体”著作不可能不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即使是近年来,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也不多见,而缺乏深入探索的重复性著作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我们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何在?这种局面的彻底改观,确实需要时间,也确实需要将毛泽东研究作一些“冷处理”。形式上的热潮,终归不可能导致研究的深入,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毛泽东研究尽量减少外部的干扰。

在本书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集中研究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毛泽东研究。在深入分析了新时期的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初步概括出这一时期毛泽东研究的若干主要的特点。从这里,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十几年来的毛泽东研究的确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毛泽东研究已经超越传统的研究规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逐渐成型。我对方法论的研究十分留意,将新时期毛泽东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作为研究的重点,分析毛泽东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的方法论特色,阐明注重方法论的探讨对深化研究主题的影响和作用。加强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

在本书中,我有意识地把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也写进来,因为毛泽东研究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已经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本世纪60—70年代,国外的现代中国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毛泽东研究成为国外学者瞩目的研究课题,并且作为现代中国研究的中心内容。这与同时代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的停滞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本书没有象国内有些著作那样对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做一般性的概述(当然,这种概述对于人们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是

有帮助的),而是将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放到整个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抓住国外毛泽东研究与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联系,紧扣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中心——美国,结合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特点,对具有指导性影响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学术论点进行较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我之所以能选取这样的研究角度,主要得益于我对美国现代中国学曾经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篇幅的限制,我对其他主要国家的毛泽东研究的分析就显得较为单薄,这是应该向读者说明的。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这本书不仅记述了我对毛泽东研究史的回顾与考察,而且包含着我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认识和对一些微观问题的具体见解。因此,我将本书定名为“毛泽东研究史论”。

我深知,要在这本小书中涵盖整个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内容,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进行科学分析,达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远非我的学力所能实现。更何况,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研究角度不同,研究者完全可以依照各自不同的毛泽东观,概括论述具有不同框架结构和不同侧重点的毛泽东研究史。如此看来,本书仅仅是著者的一次初步尝试,意在抛砖引玉,深化此项研究,书中存在的不妥之处、错误之处,敬请专家、读者予以指正。

侯且岸

1995年2月

(1)	自 叙
(1)	第一章 草创中的毛泽东研究(1936—1949)
(1)	第一节 西方新闻记者视野中的毛泽东
(1)	一、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
(10)	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
(16)	三、战时初识毛泽东
(20)	四、小 结
(22)	第二节 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展开的毛泽东研究
(22)	一、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评价
(32)	二、第一个历史性的决议
(34)	三、中共理论、文学工作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39)	四、选编《毛泽东选集》
(45)	第二章 毛泽东研究的曲折发展(1949—1966)
(45)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正式出版
(45)	一、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
(46)	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50)	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1)	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53)	五、《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55)	六、小 结

目 录

-
- (57) 第二节 以宣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毛泽东研究
- (57) 一、田家英对毛泽东著作的诠释
- (59) 二、胡乔木的毛泽东研究
- (61) 三、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的介绍
- (63) 四、李锐与毛泽东研究
- (65) 五、陈伯达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
- (69) 第三节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
- (70) 一、彭德怀、张闻天与纠“左”
- (75) 二、罗、田、杨、何的思想抗争
- (81) 三、小 结
- (85) 第三章 毛泽东研究的停滞与勃兴(1966—1978)
- (85)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研究的挫折
- (85) 一、“现代造神运动”
- (88) 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 (91) 第二节 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勃兴
- (91) 一、“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现代中国研究
- (103) 二、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勃兴
- (106) 三、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讨论及其方法论问题
- (117) 第四章 新时期的毛泽东研究(1978—1993)
- (117) 第一节 科学的毛泽东观
- (117)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 (121) 二、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 (124) 三、第二个历史性的决议

目 录

(126)	第二节 超越传统规范的毛泽东研究
(126)	一、各具特色的文集
(129)	二、具有学术深度的研究型著作
(134)	第三节 毛泽东研究的主要特点
(134)	一、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早期思想
(139)	二、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
(142)	三、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概论
(144)	四、重视研究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48)	五、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晚年
(151)	六、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 系
(154)	七、小 结
(157)	第四节 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157)	一、西方现代中国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变化
(164)	二、关于民粹主义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17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83)	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
(193)	余 论 百年诞辰纪念
(193)	一、新一代领导人的科学评价
(194)	二、毛泽东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特点
(216)	三、最后的联想
(219)	后 记
(221)	附 录:毛泽东研究书目举要

第一章

草创中的毛泽东研究(1936—1949)

第一节 西方新闻记者视野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研究的出现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规范着草创时期的毛泽东研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确切地说,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对毛泽东的研究就已经起步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研究局限在两个范围内。在国内,主要在中共内部。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为了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全党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在国外,主要在新闻界。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记者)出于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关心和同情,也出于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好奇,克服重重困难,进入红都,写出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向世界各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介绍毛泽东,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活动 and 政策主张。

一、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

在西方新闻记者当中,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早在1936年7月,斯诺作为第一位西方记者,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历尽艰辛,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了调查访问。在历时3个多月的红区生活中,他广泛、深入地了解红区,同毛泽东(斯诺是毛泽东会见第一位西方记者)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见。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写出了多篇引起举世轰动的通讯,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向外界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提供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报道”。

《红星照耀中国》写毕于1937年7月,原定名为《中国的红星》,后经斯诺的代理人亨里埃诺·赫茨建议,更名为《红星照耀中国》^①。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已发行了五版。1938年1月,该书又在美国由兰登出版社出版,同样引起轰动,甚至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注意此书。在中国,经斯诺的同意,当时“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版本和翻印本”^②。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共12篇,近30万字。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第三篇:在保安,第四

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该篇主要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曾被单独译为《毛泽东自传》^③)，第五篇：长征，第六篇：红星在西北，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第十篇：战争与和平，第十一篇：回到保安，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斯诺后来又对该书进行了几次修改和校订，使之进一步完善，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944年版、1968年版和1971年版。在修订版中，作者对原书使用的不准确的第二手材料做了删除和纠正，删减、压缩了一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冗长记述，增添了新的内容，包括跋、年表、尾声、新的注释、书目提要、附录，等等。

从《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出版以来，50多年过去了。它已陆续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以及印地安方言等近20种文字出版，从而风行各国、驰誉全球。^④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震撼世界的影响，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不朽名作，主要在于它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历史记录。首先，它第一次使世界各国人民真正地了解和理解中国革命，唤起了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向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前，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革命根据地的重重封锁，外界无法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人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国民党围剿“赤匪”、剿灭“赤匪”的扭曲的宣传报道。正如斯诺在书中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9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创作《红星照耀中国》正是为了揭开“红色中国之

谜”，解决一系列未获解答的问题^⑤。因此，斯诺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他所亲眼见到的红军、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说明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论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同时，斯诺还在书中大量引录了毛泽东发表的对时局的看法，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向全世界公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正确形象。这在当时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可以说，通过《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整个西方联系的渠道，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了中国革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转变。这样，提高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扩大了共产党人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事业中的影响。另外，“斯诺及其《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在当时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官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例如，曾较早读过《西行漫记》手稿的美国总统前侍卫长卡尔逊，在斯诺帮助下到过华北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挑起皖南事变时，他迅即面见罗斯福汇报真实情况，使得美国政府依据本身的利益，向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阻止了中国抗日阵营分裂事态的扩大。再如斯诺曾在《西行漫记》出版前，用了晚上先向谢伟思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1944年7月，谢伟思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个小组的派遣，是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接触的开端），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⑥。《红星照耀中国》也鼓舞了各国人民

的革命斗争,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系。“当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残酷统治,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战争的时期,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为能借到‘红星’这部‘奇书’的英文原版而欣喜无比,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些力量,至为喜悦。’并曾满怀激情地写过一首汉诗:‘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得把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他深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英雄红军,将是日本侵略军所难以战胜的”^⑦。“在印度,许多青年学生以‘红星’作为思想武器发动广大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年青优秀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受到‘红星’的启示毅然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的”^⑧。“加拿大著名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致友人信中表明为什么要下决心前来中国参加抗战时,曾动情地说道:‘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⑨。

其次,通过《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向外界第一次全面地介绍毛泽东,塑造了毛泽东的革命领袖形象,使人们认识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伟大革命。《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导人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再加上国民党的造谣,编造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死讯”,中共领导人的真正面目还是一个谜。斯诺对毛泽东更是茫然无知。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象,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着土制炸弹。认真思

素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做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⑩斯诺陕北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毛泽东。作为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西方新闻记者,他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他满意地说,“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⑪。斯诺经过仔细采访,写出了“毛泽东的自传”,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第三篇中,他还集中论述了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这两部分内容构成斯诺对毛泽东研究和介绍的精华,也一直被人们誉为“了解毛泽东的入门教材”。我认为,

斯诺当时对毛泽东的很多看法是耐人寻味的。例如：他认为，“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②他还特别指出，“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的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③出于西方记者的政治敏感，斯诺十分注重考察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他发现，尽管“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④。斯诺确实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他“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同时，毛泽东也“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